



彭德怀挥师西北鏖战“马家军” (四)

1948年5月7日,胡宗南、马步芳两部南追北堵,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于屯子镇、西峰镇、泾川之间地区。彭德怀又一次陷入了胡、马的包围。所幸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前来救援,彭德怀当机立断,将2纵队分成三部,分别阻击来自胡、马敌军三方面的进攻。2纵队血战两天两夜,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最终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主力部队得以从胡、马军队的严密围攻中突围。8日至11日,西北野战军又分别在董金镇以东三不同、宁县以东良平镇、栒邑(今旬邑)县城以北职田镇等地冲破国民党军的合围,于12日摆脱追堵,转至解放区马栏、转角等地,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威胁。

西府、陇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西北野战军歼敌1500多华里,深入敌人后方,连克重镇,彻底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国民党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惶恐。但战役也给西北野战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共计损失兵力1.5万人,对西北战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对于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总结出两条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轻视了“马家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是我军各部队协调配合不

到位,新编部队的整训工作没有跟上。因此,他专门抽出时间对新编部队进行整训,并对与“马家军”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这就为后来消灭“马家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局部战场的失利,并不能阻挡彭德怀解放大西北的雄心壮志。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在西北正面战场上,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嫡系新“西北军”节节败退,尤其是胡宗南收缩仅有的兵力,退守秦岭后,青宁“二马”便立刻暴露,在了解放军的枪口下。但即便是在这种紧要关头,“二马”内部矛盾斗争依然不断。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遣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遂成为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而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受到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残部开始向西收缩后,蒋介石为阻击解放军西进,命马步芳、马鸿逵组成“宁青联合兵团”,但同时蒋又不愿坐看“二马”联合势力得到增强,便授意由其一马出任西北军政长官,一马

任甘肃省主席,使其相互牵制。虽然蒋家王朝分崩离析在即,但军阀出身的“二马”仍不愿放过这一“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在其眼中,当时的西北军政长官职务,就如同胡宗南倾一时的“西北王”一样,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力宝座。

果不其然。为争权夺利,“二马”几近绞尽脑汁。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现任甘肃省主席郭寄嶠。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便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其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逵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逵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嶠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嶠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盛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

等人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截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遂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比马步芳年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但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实力终究逊马步芳一筹,他只得让步,另做打算。

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由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任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并共同出兵协议。随后不久,马鸿逵便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护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并派其所属11军和128军组成宁夏兵团,与马步芳部82军(由整编82师扩充而成)、129军、骑8旅、骑14旅组成的青海兵团相联合,组成由马继任总指挥、卢忠良任副总指挥的“宁青联合兵团”,合力进攻活动于陕西的彭德怀领导下的西北野战军。马步芳等仍做着依靠其自以为天下无敌的“马家军”,来将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变成第二个红军西路军并加以歼灭的旷世迷梦。

(未完待续)

(据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七十五期

YI MIN SUI YUE

支援宁夏 无怨无悔(四)

——宁夏卫生学校上海支宁教师马洪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马洪达与妻子顾菊英。

马洪达在辅导员的岗位时间很长,一共干了十年时间。这期间让马洪达最开心的事还是他的妻子带着心爱的女儿也迁到了宁夏。马洪达的妻子顾菊英是1955年3月下旬到宁夏,来宁前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当女工,因一人带着女儿实在不易,放弃工作来到宁夏。顾菊英来宁夏时带来了基本的生活用品,包括洗澡用的大小木盆和上海人离不开的马桶,总重量远远超过了母女二人身体的重量,换乘车辆时都要来回倒腾两三次才能把行李倒上车。来宁的路线也是先到达西安,再转乘卡车到达银川。马洪达的女儿马丽珠随母亲来宁时刚刚8岁,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她说:“路途中最难过的是黄河,而到了银川最开心的是见到了父亲。”她在回忆时说,“银川的生活很不错,物价比上海低,住的地方也全是上海人,大家还讲上海话,吃上海饭,当地人对我们很关照,从来没有排外感。”这是她和母亲告别上海时送行的乡亲们最担心的,也是她们最没想到的。

马丽珠口述:我出生在1947年,在上海即是独生子女,又是留守儿童,我在上海是跟奶奶长大的,我们离开上海时妈妈带着我照了一张相片,离开老家时的景象到今天我

也忘不掉,我和妈妈是坐着乌篷船离开家乡的,行李装了有一艘船,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岸边为我们送行,哭着呀,一路就哭着送我们,乡亲们给我妈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他们都哭着怕我们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妈特别坚决,一定要来宁夏找我家爸爸,我们刚到宁夏租住在一个民居,全是上海人,没有自来水,要到西府井去买水,那时候吃饭还不要粮票,银川人不吃鱼,上海人特爱吃鱼,银川那么大的黄河大鲤鱼便宜得很,一毛或八分就能买到一斤,还有猪蹄子,五六分钱一个,新华街的烧鸡七毛钱一个,烧得很好吃,味道跟上海的烧鸭差不多,价钱只有上海的一半,我们租住的房子比上海的还好,到银川后我上了实验小学,离家不远,1966年银川一中高中毕业后到了银川制药厂,恢复高考后我已经结婚,到了30岁了,还有三个孩子,是老三届,我又考上了大学,算是搭上了最后的班车。我妈妈到银川后一周左右就找到了工作,在宁夏水利科开始做临时工,后来工作表现好,转正了,再后来还入了党,当起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妈妈95岁去世的,改革开放后我还对妈妈说,我们再回上海看看,她都不愿意回去,她说宁夏太好了,跟宁夏人特别相处,我们一家人都有这种感受。

很好相处的宁夏人与热爱又轻车熟路的教师工作,再加上全家的团圆让马洪达一家的日子十分舒心,可惜的是这种好日子没过几天,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临了,开始是号召所有人向党交心,并开展大鸣大放活动,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委和政府改进工作,没想到半年后形势逆转,马洪达陷入其中,让他痛苦了很久很久。

(简银生 王旭阳 整理)

曾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宁夏九旬老兵离世



6月10日上午,90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余志光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位有近70年党龄的老党员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把遗体捐献给了宁夏红十字会,希望能为宁夏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

6月11日,宁夏红十字会和宁夏医科大学为老人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是宁夏第79例遗体捐献者。

余志光老人是河南永城人,1932年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950年参加抗

美援朝,编入26军,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等战斗,先后参加黄草岭阻击战、铁原拉锯战、金刚山阻击战、五次反击战、五里山守备战,在战场上受过伤,获得过多枚奖章。1953年换防回国,1955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到宁夏支援建设,1987年离休。

2021年,余志光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跟老伴商量一起把遗体捐献国家,并在病榻上写下遗书,让儿子转交给红十字会。“党教育我们要始终为人民服务,现在我打算把自

己捐给国家,尽最后一点力量。”2022年1月5日,余志光郑重地把名字签在“遗体捐献志愿登记表”上。

6月10日凌晨3时许,余志光老人离世,受老人生前嘱托,家人帮他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宁夏医科大学,成为医学教学研究的无言良师。

“爷爷生前其实还想捐献自己的器官和眼角膜,但因为年龄比较大,做过多次白内障手术,器官、角膜不能进行捐献。当年眼睛看不见要做手术时,爷爷一直惦记着捐献角膜的事,他很遗憾。”余志光老人的长孙余瑞说。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余志光老人的妻子在亲人的陪伴下前来送别,因患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她已经不认识了。她的脑海中有另一个世界,不知道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丈夫已经离开了。

但在多年前,她曾和丈夫做了一样的决定,一起捐献遗体。

在余志光老人签署的《遗体捐献志愿登记表》中,夹着一张他亲手写的文件:“李月仙同志是我的老伴,我们结婚已经60年,她在10年前患了老年痴呆,现已失去意识,我决定捐献遗体,并将她的遗体一同捐献,特写此书面材料。”

相伴一生,一起捐献遗体是两位老人最后的浪漫。

斯人已去,留下无尽的哀思,更给儿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在长孙余瑞心中,爷爷一生坚强勇敢、正直忠诚、铁骨铮铮、是非分明,思想境界很高。

“爷爷一直希望我去当兵,他从战场上下来,希望我也能够到部队去,保家卫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当兵,爷爷很失望。但爷爷自己言传身教,给了我们最好的三观教育。”余瑞说。

当老人提出要捐赠自己的遗体和器官,余瑞和家人一样,第一反应是不同意,因为接受不了至亲之人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他们希望老人百年后能够落叶归根,入土为安。

“是爷爷自己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他说,人活一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走,把遗体捐献出去,可以为祖国医学发展尽微薄之力,这是他为党、为国家、为社会做得最后一点点贡献。”

如今,爷爷的心愿完成了,余瑞觉得,他和家人也完成了一次成长。

90岁的老人用一生诠释了抗战老兵的热忱、热血和热爱,这是值得后人的尊崇和学习的英雄主义。(据光明网)

毛主席在宁夏的五天四夜

六盘山高,云海茫茫。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江西于都到贵州遵义,从四渡赤水到雪山草地。“重走长征路”,在追寻红军万里跋涉足迹的同时,无不感慨这支创下天下奇迹的劲旅,每当在千难万险之时,每逢在千钧一发之际,都离不开毛泽东的身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首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令人心驰神往地要去探寻毛主席在宁夏、在固原、在六盘山的历史足迹。

从10月5日进入西吉到10月9日兵出彭阳,1935年毛主席在宁夏固原整整停留了五天四夜。在这短暂时光里,毛主席给这段历史留下了什么?

一夜话,一场仗,一首诗。5日毛主席在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与阿訇马德海彻夜长谈,成就了“回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佳话;7日红军向六盘山挺进,在青石嘴遭遇小股敌人,毛主席果断指挥打了一场漂亮仗;7日晚至9日,毛主席率部队宿营在彭阳县乔渠村,登高

远望,构思写下著名诗篇《清平乐·六盘山》。

单家集,位于六盘山麓,宁夏西吉县东南葫芦河与好水川交汇处,地处宁夏、甘肃两省区四县交界地带,是一个回族聚居村,其中单家集约占70%。

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曾三次路过并驻扎于此,以单家清真寺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一盏煤油灯,右边之人白帽黑衣,左边之人着红军装。1935年10月5日,中央红军从甘肃进入宁夏固原西吉县,受到回汉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夜宿单家集后,毛主席拜访清真寺马德海阿訇,两人促膝长谈,书写了著名的“单家集夜话”。

单家集,永远的红色经典。“单家集之所以在红军长征史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仅是毛主席来过这里,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路过宁夏时,三次经过单家集”,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声音响亮。

1935年8月15日,为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的红第二十

五军3000多人进入单家集,这是红军首次进入六盘山回族聚居区,并制定著名“三大禁令、四项注意”;

同年10月5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来到单家集,与阿訇彻夜长谈;

1936年9月,为了给红军会师创造有利条件,西方野战军特别支队于14日占领将台堡,其先头部队到达单家集一带。红一军团在单家集驻扎的40多天里,帮助当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红军向六盘山挺进途中,在青石嘴毛主席指挥红军打了一场迂回歼灭的漂亮仗。”原固原市原州区党史办主任魏国营介绍说。

10月7日凌晨,离开单家集毛主席率部从张易堡出发,沿小水沟登上六盘山。这时突然发现有两个连的敌人进入六盘山下的青石嘴,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当机立断,指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半个小时结束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不仅没有伤亡,还俘虏了200多人,缴获了140匹马,8辆马车和一些重要

的军需物资。毛主席当即决定成立了第一支红军骑兵侦查连。

青石嘴战役后,毛泽东率领红军翻越六盘山,沿战国秦长城疾步行军。7日晚毛泽东夜宿小岔沟,8日晚转往乔渠村乔生魁家。

毛泽东登上六盘山主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深情地对张闻天等同志说:“这里可观三省,快到陕北了!”休息片刻又说:“你们看,现在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景色多美好哇!”

当晚,在小岔沟张有仁家的土窑里,毛主席诗兴勃发,吟出《长征谣》:“天高云淡(呀),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到陕北后,毛主席在瓦窑堡将其修改为气势磅礴的《清平乐·六盘山》。

八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单家集旧貌换新颜。

“乡亲们总是说,今天我们日子越过越好,都是托毛主席的福……”西吉县兴隆镇相关负责人激动地说,经过70年的发展建设,兴隆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经济日报》)

三位军垦知青的支宁故事(六)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刘金环在党50年时宣誓。

刘金环的爱人赵杰,是一位天津知青,原在黄羊滩农场扬水站工作,是一名电工,1980年8月才回到天津。

1980年12月,刘金环最后一个离开黄羊滩农场,被调往北京农垦部农工商企业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没有按照农场级领导对待。

1984年刘金环调往天津市妇联工作,从事妇联工作以后,有着15年知青经历的磨练,让她的工作得心应手,解决问题的能力日臻完善,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广大干部的好评,没有几年时间,就被提拔为天津市妇联城乡工作部部长。

就像刘金环应邀参加宁夏农垦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记者采访她时说得那样:“在宁夏军垦十几年的知青经历垫底,为我们今后的成长,为我们知青回城以后的再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知青经历磨练了我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成长。”

回到天津以后的刘金环,还念念不忘宁夏农垦的父老乡亲,三次带队来到宁夏农垦,看望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畅谈那峥嵘岁月的知青往事,回忆宁夏军垦农垦艰苦并美好的时光。

知青家里有困难的,有知青去世的,刘金环都要和爱人一起去看望慰问,送去慰问金,送去知青的那

一份情谊,让知青的家人感受到,知青的情谊绵绵不断,知青的情谊是温暖永恒的。

只有一米五八八个头的刘金环,性格开朗,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她领导作风泼辣,但又不善玩笑,给人一种严肃认真的感觉。她和知青朋友打成一片,成为了知青朋友的贴心人,是知青们的领头人,深受知青们的拥戴。

17岁那年,上山下乡的激情在刘金环身上燃烧,她当时迷上了建设兵团的那套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帽徽,但依然神采飞扬,光荣无限。她悄悄地偷出了户口本参加报名。虽然天气暖和,衣着单薄,但是她却穿上了厚重的衣服,口袋里装满沉重的东西,为了不让她出来她只有80斤重。刘金环如愿以偿了。

宁夏军垦时期的这三位知青的故事,像一道道崎岖不平的小路最后通向了坦途的远方,像一幅幅铺满鲜花的光彩的历史画卷,又像往事岁月的星空里划过一道耀眼的星光,一个个深情凝重而又沉重味重,给人们带来无限而美好的回味和向往。

虽然岁月无情,她们却是万幸的,她们的脚下有幸运的土壤,也有她们奋力跋涉的足迹,有军垦农垦各级领导的培育扶植,更有她们挥洒下的辛勤汗水的浇灌,才使她们茁壮、稳健地成长,笑对灿烂的人生。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